

拓跋鮮卑的南下傳說 ——北魏的歷史認識*

松下憲一著**、陳識仁譯***

摘要

關於拓跋人的原居地，在《魏書》的〈禮志〉、〈烏洛侯國傳〉、〈序紀〉中有不少相關記載，早期即有學者根據上述文獻推測，鮮卑拓跋部居住地在大興安嶺一帶。爾後，在黑龍江、遼寧、內蒙古等地發現不少拓跋鮮卑遺址，加上1980年發現的嘎仙洞祝文，大興安嶺北段被認為是拓跋部原住地，且能與《魏書·序紀》的南遷路線結合，逐漸成為學界主流說法。

當然，也有不少聲音，質疑上述主流說法。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重新探討《魏書》中涉及拓跋部原住地及南遷路線的相關記事。特別針對《魏書》中的〈序紀〉、〈烏洛侯國傳〉、〈禮志〉三篇，嘗試透過深入的分析，探討各篇章的寫作意圖和背景，進而闡明北魏的歷史認知。

關鍵詞：拓跋鮮卑、南遷傳說、《魏書》、歷史認知

* 〈拓跋鮮卑の南下伝説——北魏の歴史認識〉，原刊《愛知学院大学文学部紀要》，50（名古屋，2020），頁242(51)-225(68)。

** 愛知学院大学文学部歴史学科教授

***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前言

關於創建北魏王朝的鮮卑拓跋部的原住地，《魏書》卷 108〈禮志一〉記載：

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

還有，同書卷 100〈烏洛侯國傳〉提到：「世祖真君四年（443）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根據這些記述，白鳥庫吉推測應在嫩江流域的大興安嶺一帶。¹之後，內田吟風和馬長壽也表達同樣的見解。²1960 年代，宿白在黑龍江、遼寧和內蒙古發現拓跋鮮卑遺址，並結合《魏書·序紀》記載，提出拓跋部的南遷路線。³再者，米文平於 1980 年在大興安嶺北段嘎仙洞內發現太平真君四年

¹ 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史學雜誌》，第 21-24 編（東京，1910-1913），後收入白鳥庫吉，《塞外民族史研究（上）》（東京：岩波書店，1986 年），頁 63-320。

² 內田吟風，〈魏書序紀特に其世系記事に就て——志田不動磨學士「代王世系批判」を読む〉，《史林》，22：3（京都，1937.7），頁 19-45，後改題〈魏書序紀特に其世系記事に就て〉，收入內田吟風，《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頁 95-118。內田吟風，〈烏桓族に関する研究：上代蒙古史の一部として〉，收入田村実造編，《滿蒙史論叢》第四（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43.9），頁 1-104；後改題〈烏桓鮮卑の源流と初期社会構成——古代北遊牧民族の生活〉，收入內田吟風《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頁 1-93。內田吟風、田村実造等譯注，《騎馬民族史 1·正史北狄伝》，（東京：平凡社，1971）。馬長壽，《烏桓與鮮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頁 239。

³ 宿白，〈東北內蒙古地區的鮮卑遺跡——鮮卑遺跡輯錄之一〉，《文物》，1977：5（北京，1997.5），頁 42-54。

的碑文，認為嘎仙洞就是《魏書》記載的國家先帝舊墟石室。⁴根據這一發現，嘎仙洞所在的大興安嶺北部被認為是拓跋部原住地，即〈序紀〉所說的大鮮卑山，可與宿白的南遷路線相結合，為目前之定論。

但是，對於將嘎仙洞視為拓跋部原住地的觀點，有不少研究提出異議，其中很多都對〈烏洛侯國傳〉的內容提出質疑。⁵也就是說，烏洛侯國是如何得知石室就是北魏先帝舊墟的呢？對此疑問，羅新的看法很有洞見，他認為烏洛侯國報告中對嘎仙洞的發現，能為拓跋部起源提供堅實證據，因此被太武帝（408-452，423-452在位）接受，它可強化北魏在北方統治的合法性，是太武帝推動的拓跋集團歷史建構的一部分。⁶

此外，吉本道雅詳細檢討《魏書·序紀》的構成，結果表明，〈序紀〉是為了表明中華正統性及北族正統性，引用大量古代典籍創作而成。⁷吉本的研究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新提出拓跋部原住地以及南遷路線，仍然存在一些疑問。

因此，本文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重新探討《魏書》中涉及拓跋部原住地及南遷路線的相關記事（〈序紀〉、〈烏洛侯國傳〉、〈禮志〉），探討各篇章的寫作意圖和背景，進而闡明北魏的歷史認知。

⁴ 米文平，〈鮮卑石室的發現與初步研究〉，《文史》，1981：2（北京，1981.3）頁1-7，後收入米文平，《鮮卑史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頁29-36。

⁵ 主要研究，諸如張博泉，〈嘎仙洞刻石與對拓跋鮮卑史源的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1993：1（哈爾濱，1993.4），頁55-61；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李志敏，〈嘎仙洞的發現與拓跋魏發祥地問題〉，《中國史研究》，2002：1（北京，2002.2），頁59-69；楊軍，〈拓跋鮮卑早期歷史辨誤〉，《史學集刊》，2006：4（長春，2006.7），頁124-131；韓昇、蒙海亮，〈隋代鮮卑遺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學術月刊》，2017：10（上海，2017.10），頁128-140。

⁶ 羅新，〈民族起源的想像與再想像——以嘎仙洞的兩次發現為中心〉，《文史》，2013：2（北京，2013.5），頁5-25。

⁷ 吉本道雅，〈魏書序紀考証〉，《史林》，93：3（京都，2010.5），頁58-86。

第一章 《魏書·序紀》的檢討

關於〈序紀〉，自內田吟風以來已有許多研究。⁸這些研究主要關注〈序紀〉的內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拓跋部的歷史。但〈序紀〉中關於神元帝（拓跋力微，174-277，220-277在位）以後的記載，大致被理解為能反映歷史事實。

另一方面，有人認為神元帝以前的記事，是道武帝（371-409，386-409在位）登基時的創作。但是，哪些具體內容是後世的創作，則意見不一。志田不動磨認為，從成帝毛（?-前204，前207-前204在位）到聖武帝（譯按：即詰汾）等君長都是虛構人物；內田吟風則認為反映的是真實存在的部族領袖；而白鳥庫吉則認為其中部分是真實人物。不過，即使像內田吟風那樣，認為是部族領袖傳說的記錄，也同意〈序紀〉有部分內容已被修改。例如將同時並存的部族領袖改為線性的縱向排列，以凸顯世系長度；以諡號和單名標誌部族領袖；以及因無特殊內容只好記錄部族領袖的即位和死亡等。然而，關於宣皇帝推寅，兩個字的名諱顯然與其他君長不同，又與王沈（?-266）《魏書》中出現的檀石槐（136-181）西部大人推演同名，因此被認為是同一人，且實際存在。至於獻帝推寅和西部大人推演是否為同一人，後文將再討論。

那麼，與本文有關的是〈序紀〉中神元帝以前的記載。特別是原本居住在大鮮卑山的族人在宣皇帝時移居到大澤，聖武皇帝時再遷到匈奴故地的描述，是否是基於拓跋部傳說的史實。先前的研究多認為，拓跋部自稱黃帝後裔是一種假託，但幾乎沒有研究者對他們曾居住在大鮮卑山這一點表示存疑。這應該是立基於拓跋部被認為是鮮卑的前提而來，但吉本詳細考證〈序紀〉記載的史源，明確指出相關部分幾乎都是道武帝以後的創作。但一部

⁸ 內田吟風，〈魏書序紀特に其世系記事に就て〉，頁95-118；志田不動磨，〈代王世系批判〉，《史学雜誌》，48：2（東京，1937），頁69-104；志田不動磨，〈代王世系批判〉，《史学雜誌》，48：3（東京，1937），頁49-80；田村実造，〈北魏開国伝説の背景〉，《東方学論集》通号 2，1954，後收入田村実造，《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動期：五胡・北魏時代の政治と社会》（東京：創文社，1985），頁179-193。

分也確實反映拓跋部的傳承，因此吉本提出新南遷路線的看法。

因此，透過吉本的研究，再次確認〈序紀〉記載的史源，可確知〈序紀〉相關內容是利用古典文獻創作而來，並檢討吉本提出的南遷路徑是否恰當。為方便分析，以下將〈序紀〉相關部分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

①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②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③昌意少子，受封北土，④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⑤其後，世為君長，⑥統幽都之北，⑦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⑧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⑨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⑩爰歷三代，以及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

〈序紀〉開篇的①「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來自《國語·晉語四》的「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史記·五帝本紀》的「黃帝二十五子」。②「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似乎是來自《史記·秦本紀》的「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這是應用了黃帝後裔也有居住在夷狄之地的說法。③「昌意少子，受封北土」中的昌意是黃帝的第二個兒子，《史記·五帝本紀》提到「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昌意住在若水。從昌意娶蜀山氏女可知，此若水是蜀地（四川）的河流，與昌意少子受封北土並不符合。但是，《今本竹書紀年》卷上有「昌意降居弱水」，指昌意居住在弱水。弱水在《三國志》卷30，〈夫餘傳〉有「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這裡的弱水是夫餘之北的河流，符合北土之說。所以應該是採用

《今本竹書紀年》的記載。這點與吉本提出的南遷路線有關，後文將再詳述。

④「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明顯是來自王沈《魏書》的「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此外，關於稱其為大鮮卑山，吉本認為這是為了與拓跋之前的鮮卑諸部有所區分，這是合理的觀點。⑤「其後，世為君長」，這與王沈《魏書》所記檀石槐死後才開始的大人世襲制度有所矛盾。吉本指出，這是為了顯示拓跋部君長永續世襲性而採取的操作。⑥「統幽都之北」引用《史記·五帝本紀》中的「居北方，曰幽都」，幽都代表北方，幽都之北表示更遠的北方地區。⑦「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是以《史記·匈奴列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其俗，竟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以及王沈《魏書·烏丸傳》的「刻木為信，邑落傳行，無文字」為基礎。只是，後半的「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可能指的是歌頌拓跋部歷史的「真人代歌」。

⑧「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是來自《史記·五帝本紀》中的「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並據此假稱為拓跋氏的起源。據羅新指出，拓跋一詞在古突厥語中意思為「土地的主人」，是由官職名稱衍化為部族名稱，⁹因此，土德王雖是一種假託，但「托」指土地、「跋」指君主或主人的解釋，符合「土地的主人」之意。

⑨關於「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始均最早出現在《山海經·大荒西經》：「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是北狄祖先的身分出現，但這裡卻稱他為黃帝之孫。同樣，始均追逐女魃至弱水之北的情節亦可見於《山海經·大荒北經》「黃帝乃

⁹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56。

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祖」，但此處始均被記為叔均。在〈序紀〉裡，始均是以黃帝之孫身分在堯時任官的黃帝後裔人物，顯然是將在黃帝時任官並逐女魃而成為田祖的叔均事蹟，改編成堯時任官的始均的功績。更重要的改編，是〈序紀〉將《山海經》中的「赤水之北」改為「弱水之北」。吉本認為，因弱水在拓跋實際記憶中是不可或缺的，所以特意加以改編。但筆者認同園田的觀點，因為赤水並不適合作為北方河流的名稱，因此將其改為北方的河流弱水。¹⁰

⑩「爰歷三代，以及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則是源自《史記·匈奴列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而轉移」，認為從夏商周三代到秦漢，拓跋部與中華沒有往來交流，所以史書中沒有記載。

以上，〈序紀〉的第一部分是黃帝之孫、昌意少子居住在大鮮卑山，成為拓跋部的祖先。其後裔始均於堯時任官，將女魃放逐到弱水之北而成為田祖（土地神）。此後，他們在秦漢之前都不曾與中華世界交流，所以事蹟未見於史書中。

第二部

⑪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聰明武略，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崩。

節皇帝諱貸立，崩。

莊皇帝諱觀立，崩。

明皇帝諱樓立，崩。

¹⁰ 園田俊介，〈北魏・東西魏における鮮卑拓跋氏（元氏）の祖先伝説とその形成〉，《史滴》，27（東京，2005.12），頁63-80。園田認為《晉書》的記載，將弱水模糊地認定為北方的河川，但根據《三國志·夫餘傳》，弱水是流經夫餘北方的河川，這樣認定它是東胡居住的鮮卑山附近的河川是合理的。

安皇帝諱越立，崩。

⑫宣皇帝諱推寅立。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

景皇帝諱利立，崩。

元皇帝諱俟立，崩。

和皇帝諱肆立，崩。

定皇帝諱機立，崩。

僖皇帝諱蓋立，崩。

威皇帝諱儉立，崩。

獻皇帝諱隣立。時有神人言於國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居。」帝時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⑬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⑭始居匈奴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

⑮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欸見輜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帝崩。

首先，⑪從「積六十七世」到成帝即位，統領北方三十六國、九十九姓，據吉本研究，¹¹成帝在位時間為公元前 201 年到前

¹¹ 吉本以神元帝即位的庚子年（220）為基準，依每一世代30年加以計算。

172年，與漢高祖（?-前195，前202-前195在位）、匈奴冒頓單于（?-前174，前209-前174在位）時代重疊，顯示拓跋部與漢、匈奴處於對等地位。其後，記節帝、莊帝、明帝、安帝的即位和崩逝，然後是⑫宣帝的出場。宣帝在位時間是公元前51年至前22年，正是匈奴呼韓邪單于（?-前31）入朝的西漢甘露三年（前51年），標誌著拓跋部取代匈奴成為北族霸主。至於宣帝所遷往的大澤，可能是依據《山海經·海內西經》的「大澤方百里，群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雁門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東胡在大澤東」；還有《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大澤方千里，群鳥所解」而來的吧。《山海經·海內西經》所標示的大澤位置，是在雁門之北，而雁門在高柳之北，高柳在代的北方，而且大澤的東邊還有東胡。（參照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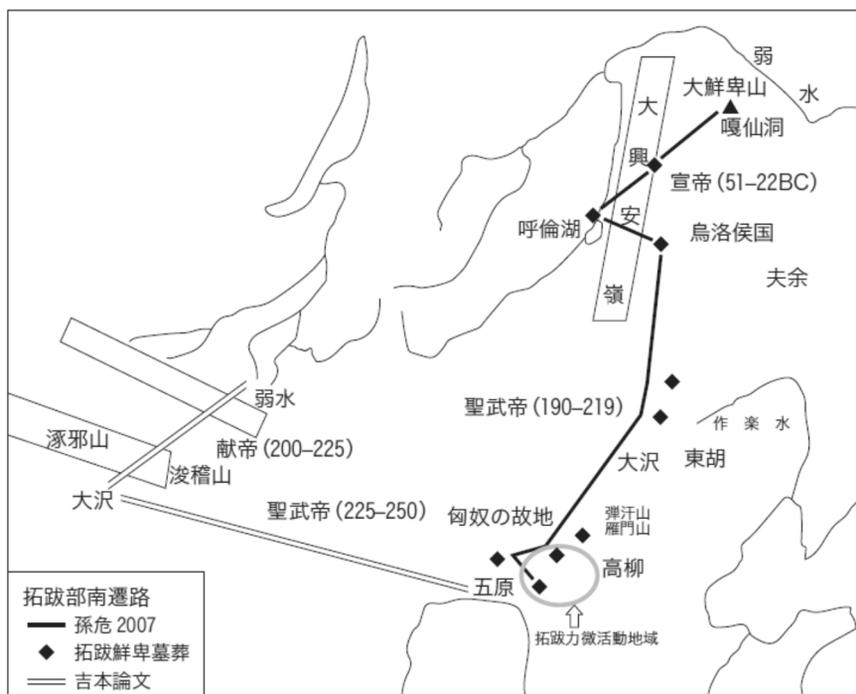


圖 1 拓跋部南遷路線圖

資料來源：吉本道雅，〈魏書序紀考証〉，《史林》，93：3，京都，2010.5，頁75，松下憲一增補。

其後，記景帝、元帝、和帝、定帝、僖帝、威帝的登基和崩逝，接著獻帝出場。獻帝在位年為公元160-189年，吉本認為，〈序紀〉所記載的宣帝和獻帝都被稱為「推寅」，而且宣帝南遷後，獻帝也企圖南遷，這意味著宣帝是獻帝的分身，而且獻帝是王沈《魏書》中的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然而，如果獻帝是西部大人推演，為什麼他的名諱不是推演而是鄰呢？〈序紀〉中提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意思是宣帝和獻帝因領導部族南遷，同樣獲得鮮卑語中有鑽研之義的「推寅」稱號，這可能是為了強調南遷的正確性，同時似乎也與西部大人推演有所關聯。筆者認為，獻帝未被標記為西部大人推演，反而暗示獻帝並非推演。

獻帝企圖南遷，因年老只好將托討給兒子聖武帝。聖武帝在神獸的協助下，終於抵達匈奴的故地。神獸被描述為形似馬、聲類牛，佐藤賢認為這種動物是馴化後的馴鹿，而聖武帝的南遷是以原棲息於西伯利亞而向大興安嶺北部遷徙的馴鹿做為雛形，進而轉用到宣帝和聖武帝的南遷故事。¹²然而，神獸未必是真實存在的動物。《魏書》卷108之1〈禮志一〉記載：「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黃星顯曜，其符也」，神獸如牛是因為牠是土德的聖獸。另一方面，引導聖武帝的神獸外形似馬，這又暗示馬是北方民族的聖獸。換言之，神獸可能是結合北方民族聖馬和土德聖牛而想像出來的動物。¹³

當聖武帝抵達匈奴故地時，王沈《魏書》記載：

檀石槐既立，乃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乃分其地為中東

¹² 佐藤賢，〈鮮卑拓跋氏の南下伝説と神獸〉，《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8（福岡，2010.4），頁1-29。

¹³ 田村実造在其著作《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動期：五胡・北魏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中提到：「『神獸』被認為是仿照遊牧民族經常選擇的圖騰——馬和牛，這與後來契丹族的青牛白馬傳說有相似的軌跡。」（頁189-190）。筆者認為，牛可從《魏書·禮志》裡的解釋，意味土德之獸。

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東接夫餘、濊貊為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而制屬檀石槐。

文中提到檀石槐所統治的匈奴故地。其範圍南至漢地、北至丁令、東至夫餘、西至烏孫。此外，檀石槐將王庭設在高柳以北三百里的彈汗山和啜仇水旁，並將領土分為三個部分。東部從右北平到遼東的二十多個邑，由彌加、闕機、素利、槐頭等大人率領。中部自右北平到上谷的十多個邑，由柯最、闕居、慕容等大人率領。西部從上谷到敦煌的二十多個邑，由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大人率領。

檀石槐的鮮卑國家與夫餘相接壤。夫餘北方流淌著弱水，這可從《三國志·夫餘傳》的「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得知。此外，檀石槐的王庭設在高柳以北，這與《山海經·海內西經》中大澤的位置相符。聖武帝前往匈奴故地，表示他參與了檀石槐的鮮卑國家，而且與西部大人推演有關聯。

⑮講述聖武帝和天女交合後，神元帝誕生的故事，正如田村実造所指出，這是一種神人交合的傳說，旨在神格化神元帝，不過是拓跋部建國傳說的一部分。¹⁴神元帝的廟號是「始祖」，意味著神元帝被視為拓跋部的開創者。這種認知可能源於傳承拓跋部歷史的「真人代歌」。因此，可以認為，神元帝的誕生故事以及其即位後的記載，是基於拓跋部本來的歷史傳承（真人代歌）；而在此之前的部分可能是與部族傳承無關，而是後世創作的歷史認知。

第二部中描述成帝在與匈奴冒頓單于和漢高祖同的時期，在

¹⁴ 田村実造，《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動期：五胡・北魏時代の政治と社会》，頁192。

北方擴展勢力。宣帝時期，由於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漢朝，原本的匈奴控制地區出現真空，拓跋部移居至該地。此外，也表明了聖武帝參加檀石槐的鮮卑國家並成為西部大人的這一歷史認知。與第一部結合起來看，拓跋部在大鮮卑山居住，隨著匈奴南下而遷至大澤，並在匈奴被鮮卑檀石槐所取代時，加入成為該國家的西部大人。這種描述反映的是從大鮮卑山到大澤、再到匈奴故地西部的南遷過程。與此同時，這也主張拓跋部以黃帝子孫身份的中華正統性，及其大鮮卑山為據點統治北方，最終加入檀石槐鮮卑國家的北方民族正統性。

本章最後討論吉本的南遷路徑。吉本認為〈序紀〉中的「大澤」和「弱水」是與拓跋部歷史相關的實際地名。其根據是，這兩個地名利用《魏書》編纂時與〈序紀〉最相近的原資料基礎上而出現的實際地名，且「大澤」和「弱水」在方向上看起來是相同的。

吉本所依據的史料是《魏書》中的〈崔浩傳〉和〈蠕蠕傳〉。這兩篇文章都涉及到太武帝時期對柔然的遠征。〈崔浩傳〉記載，太武帝在神䴥二年（429）沿弱水向西行進，抵達涿邪山。另一方面，〈蠕蠕傳〉則記載太延四年（438）太武帝到達浚稽山後，將部隊分為兩支，陳留王崇從大澤出發前往涿邪山，太武帝則從浚稽山出發向天山前進。綜合這兩則記事，可知沿弱水向西行的方向有涿邪山，而涿邪山附近有大澤（參見地圖）。因此，吉本認為拓跋部的南遷，是指從外蒙古的「弱水」流域（今土拉河）移動到涿邪山附近的「大澤」，然後繼續沿著通往匈奴故地的五原郡塞外的路線。

對此，筆者認為，首先關於弱水，《山海經·大荒北經》中的「赤水」在〈序紀〉裡被改為「弱水」，並非因為這是拓跋部實際記錄存在的名稱，而是為了將其描述成北方的河川。且根據《三國志·夫餘傳》，弱水是位於鮮卑所在的遼東塞外的河川，符合〈序紀〉裡的世界觀。

至於大澤，如果循著《山海經·海內西經》中大澤的位置，

那麼它也符合檀石槐的鮮卑國家的領地。大澤位於檀石槐設置王庭的高柳以北，它位於自大鮮卑山南下到匈奴故地的路徑上。另外，《魏書》有八次提到大澤（其中一次在〈序紀〉），¹⁵《魏書》中提及的大澤指的是各地存在的湖泊，吉本所指的大澤也只是其中的一處，並非特定地點的地名。因此，僅憑〈序紀〉的弱水和大澤來斷定它們是拓跋部實際記憶中的地名，這是不可行的。

第二章 〈序紀〉的史料來源

前一章所討論的〈序紀〉的史料來源是什麼呢？〈序紀〉的史料來源被認為包括「真人代歌」和鄧淵(?-403)的《代記》。首先，關於「真人代歌」，《魏書》卷109〈樂志〉提到：

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

「真人代歌」是將祖宗的開基由來、君臣興廢的史跡編成150章的作品，在後宮早晚歌唱，也在郊廟的祭祀和饗宴上演唱。此外，

¹⁵ ①北齊·魏收撰，《魏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5，〈拓跋崇傳〉，頁382：「從征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越涿邪山，威懾漠北。」②同書，卷27，〈穆崇傳〉，頁662：「初，太祖避窟咄之難，遣崇還察人心。崇夜至民中，留馬與從者，乃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為舂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於坑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而號，崇乃覺悟，馳馬隨狼而走。適去，賊黨追者已至，遂得免難。」③同書，卷40，〈陸倕傳〉，頁918：惜哉！叡、琇以沉雅顯達，而釁逆陷禍。深山大澤，實有龍蛇。」④同書，卷99，〈張玄靖傳〉，頁2197：「東苑大冢上忽有池水；城東大澤，地忽火燃，廣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⑤同書，卷102，〈粟特國傳〉，頁2270：「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⑥同書，卷103，〈蠕蠕傳〉，頁2294：「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為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⑦同書，卷103，〈蠕蠕傳〉，頁2298：「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潔七日，祈請天上。」這些引用描述了不同地點或事件。其中，①和⑥描述的可能是同一地點，②和⑦的地點不明確，③是抽象的表述，④指姑臧城東部，⑤是指鹹海。

《舊唐書》卷29〈音樂志〉記載：

北狄樂，其可知者鮮卑、吐谷渾、部落稽三國，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後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辭。按今大角，此即後魏世所謂簸邏迴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辭。北虜之俗，呼主為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歌辭虜音，竟不可曉。

「真人代歌」本是騎馬時演奏的軍樂之一，唐代將其歸類為北狄樂。150章中，到唐代僅留存53章，其中標題明確的有六章，其餘則因多次出現「可汗」一語，被認為可能是慕容燕（前燕，337-370）和北魏時期的鮮卑語歌曲，歌詞也是鮮卑語，所以意義難以理解。¹⁶

田餘慶認為，「真人代歌」是經過道武帝刻意挑選和部分改編的「燕魏之際的鮮卑歌」。嚴格來說，「燕魏之際」是指道武帝建立天子旌旗的皇始元年（396），到平定後燕並定都平城的天興元年（398）這段時期。鄧淵在這段期間收集「真人代歌」。道武帝利用拓跋部的傳說和鮮卑各部共同傳承的傳說，編製成頌揚先人功績的歌謠，並通過在代人中廣泛傳唱，以形成支持帝業的輿論。田餘慶指出，「真人代歌」旨在增進代人的凝聚力，這點非常重要。¹⁷根據《魏書·樂志》，「真人代歌」創作於道武帝即皇帝位的天興元年到六年之間。此期間，隨著皇帝即位，國家制

¹⁶ 關於「真人代歌」，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の樂制と国家：日本雅樂の源流》（京都：文理閣，2013），認為是以鮮卑語歌唱的北魏創世故事和君臣興廢的歷史。

¹⁷ 田餘慶，《拓跋史探（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頁208。

度得以整備、設立京畿和郊甸，同時打造代人集團。「真人代歌」正是在提高畿內代人凝聚力的時空背景下所創作。「真人代歌」中的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等篇章所涉及的君臣興廢之跡，可能歌頌的是道武帝的征討事業。再者，「真人代歌」所歌頌的「祖宗開基所由」，這裡的祖宗開基由來應該指的是始祖神元帝力微的誕生故事，而非黃帝子孫居住在大鮮卑山的傳說。

關於道武帝即位，《魏書》，卷108之1，〈禮志一〉：

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壇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靈。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緒，思寧黎元，龔行天罰。殪劉顯，屠衛辰，平慕容，定中夏。羣下勸進，謂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時人謀，不可久替，謹命禮官，擇吉日受皇帝璽綬。惟神祇其丕祚於魏室，永綏四方。」事畢，詔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羣臣奏以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黃星顯曜，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數用五，服尚黃，犧牲用白。

即位的祝文中寫著「我祖宗世代為幽都之王」，這與〈序紀〉中「世世君長，統幽都之北」的表述相類似。同時，對成帝以下的君主及其妃子追尊諡號，¹⁸並依崔宏(?-418)等人的上奏，確定為黃帝子孫、屬土德。因此，可以看出在這個時期確立了黃帝後裔、土德、祖宗是幽都（北方）的統治者，並編作成帝以後的系譜。

此外，根據《魏書》卷57，〈高祐傳〉可推測，〈序紀〉中提及的黃帝子孫始均，也記載在鄧淵編纂的《代記》中：¹⁹

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

¹⁸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2，〈太祖紀〉，天興元年十二月條，頁34。

¹⁹ 田餘慶，《拓跋史探（修訂本）》，頁214；佐川英治，〈東魏北齊革命と『魏書』の編纂〉，《東洋史研究》，64：1（京都，2005.6），頁37-64。

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疏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

高祐(?-499)所閱覽的《國記》，記載著自上古以來歷經始均再到成帝的內容，但從始均到成帝之間世代久遠，所以史書沒有傳承。這正好印證〈序紀〉中「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的記述。鄧淵《代記》的編纂時間被認為大約在天興五年(402)到天賜四年(407)之間，《代記》可能以編年體形式記述黃帝子孫居住在大鮮卑山、從始均到成帝，再到道武帝之前的歷史。正如田餘慶所指出，《代記》和「真人代歌」後來成為〈序紀〉的史料來源，²⁰但《代記》和「真人代歌」的內容和編寫目的並不完全一致。《代記》旨在從中華的正統性和鮮卑的正統性兩方面，保證道武帝以皇帝登基的正統性；而「真人代歌」則通過溯源神元帝——而非黃帝——以確立拓跋部統治北族的正當性。因此，《代記》在吸收拓跋部本來的部族傳承「真人代歌」之際，也利用中華古典創造出神元帝以前的歷史。這部《代記》即高祐所閱覽的「國記」，魏收編寫〈序紀〉時也曾採用。

那麼，道武帝時期編纂的「真人代歌」和《代記》，已可確認是〈序紀〉的史料來源。然而，也必須考慮到，在這一個時期的拓跋部的歷史認知形成過程裡，後燕慕容部的歷史認知也可能有影響。五胡諸國各自編纂國書，北魏在征服後燕國都中山時獲取了這批圖書。這應該是北魏最早獲得的五胡諸國國書。《魏書》，卷2，〈太祖紀〉記載，皇始二年(397)十月：「獲其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簿列數萬」，獲得後燕所藏圖書。可以推測其中包含後燕的國書，因為在此八個月前，曾為慕容暉(350-384)效力並撰有《燕記》的崔暹(?-399)投奔了北魏。崔暹是清河東武城人，三國曹魏崔琰(163-216)的六世孫。祖父崔遇、父親崔瑜都曾在後趙石虎(295-349, 334-349在位)時期任官。崔暹年輕時好學有文才，因戰亂中失去父親，自己靠務農為生。後

²⁰ 田餘慶，《拓跋史探（修訂本）》，頁212。

來，在前燕慕容暉時期擔任著作郎，撰寫《燕記》。此後，他先後仕於苻堅（338-385，357-385 在位）、司馬昌明（362-396，372-396 在位）、翟遼（?-391，388-391 在位），最終在後燕慕容垂（326-396，384-396 在位）時擔任秘書監。慕容垂死後，內亂爆發，慕容麟（?-398）自立，崔逞帶著妻小逃亡到北魏。投奔之初，他頗受優遇，擔任尚書、門下、御史中丞等職，但在天興二年（399），因在寫給東晉郗恢（?-398）的信中未貶低東晉皇帝的稱號而激怒道武帝，被賜死。²¹此外，根據《資治通鑑》，崔逞擔心戰亂導致家族斷絕，他將妻子張氏和四個孩子留在冀州，其妻、子後來逃往南燕，也是他被賜死的原因之一。²²

和崔逞同樣曾為慕容暉效力的封懿（?-417）也流亡北魏。封懿是渤海蓀人，他的父親封放在慕容暉時期擔任過吏部尚書。封懿在慕容寶時擔任中書令和民部尚書，但在慕容寶（355-398，396-398 在位）被道武帝擊敗後逃往北魏。道武帝經常引見封懿，詢問關於慕容的舊事，但因封懿應對態度怠慢而被黜廢。到明元帝（392-423，409-423 在位）時期再次被召回，擔任都座大官，於泰常二年（417）去世。封懿撰有《燕書》，頗行於世。²³

曾在慕容燕任職的漢人逃亡北魏，道武帝透過他們獲得慕容部的史書和歷史認知。此中，最具核心作用的人物是崔宏（?-418）。崔宏是清河東武城人，三國曹魏崔林（?-245）的六世孫。祖父崔悅在石虎時擔任司徒左長史，父親崔潛曾在慕容暉時擔任黃門侍郎。崔宏曾效力前秦，之後又在後燕慕容垂手下擔任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當道武帝攻進常山城時，崔宏往東逃亡但被捕獲，經道武帝引見後任命他為黃門侍郎。與張袞（339-410）一同參與官爵、朝儀、音樂、律令、國號、五行等國家制度的創建。道武帝經常引見崔宏，詢問古今舊事，特別是有關王者的制度、治世規則等問題。崔宏則講述有關古人制定的制度、明

²¹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32，〈崔逞傳〉，頁758。

²²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11，〈晉紀〉，安皇帝丙隆安三年八月條，頁3494-3495。

²³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32，〈封懿傳〉，頁760。

君賢臣事跡，以及過去王朝興衰原因等，都頗能契合道武帝的心意。²⁴

此外，與崔宏一起，在引入中華王朝制度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物是《代記》的編撰者鄧淵。鄧淵在後燕被平定後效力於道武帝，因熟知舊事而與崔宏一同參與國家制度的創立。天興元年，他收集「真人代歌」，並受道武帝之命編纂國記，撰寫成十餘卷的《代記》，這部史書以編年體形式記錄歷史事件。²⁵前文提到《代記》成為〈序紀〉的史料來源，但《代記》的內容並非鄧淵個人的歷史認知，說它反映的是由道武帝和舊後燕系漢人共同形成的北魏歷史認知，應不為過。

在崔宏參與決定五行為土德的過程中，理由是拓跋氏為黃帝的子孫，而拓跋氏自認為是黃帝後裔的認知，早在代國時期就已存在。這從晉光熙元年（306），大邗城南立有刻寫「魏，軒轅之苗裔」（見《魏書》，卷23，〈衛操傳〉）的碑銘一事可以得知。儘管建立碑文時尚未稱「魏」，這個「魏」字應是後世所修改，但內田仍評價「軒轅之苗裔」是拓跋氏自稱黃帝後裔的現存最古老文獻。²⁶這份碑文是漢人衛操為了讚頌桓帝（拓跋猗叡，267-305，295-305在位）而製作，內田認為，衛操宣稱拓跋氏為黃帝子孫，是當時歸附拓跋部的漢人臣僚，在不願被稱為「蠻族」臣子的心情下所促成的發想。不論此推測是否還有待商榷，但這個想法無疑是由漢人提出的。此外，當時尚未出現黃帝子孫與土德相連結的觀念，拓跋氏為土德是道武帝即位時的事。拓跋氏主張土德只有在自認為是正統王朝的情況下才有意義，在仍奉西晉為正朔的階段是不存在的。吉本認為，拓跋土德說是在黃帝後裔說的前提下，次第形成的。²⁷

以上，說明了道武帝即位時期，曾效力慕容燕的漢人在歷史

²⁴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24，〈崔玄伯傳〉，頁620-621。

²⁵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24，〈鄧淵傳〉，頁635。

²⁶ 內田吟風，〈魏書序紀特に其世系記事に就て〉，見氏著，《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頁97。

²⁷ 吉本道雅，〈魏書序紀考証〉，頁61。

認知形成中所起的作用，那麼，這與慕容燕的歷史認知有關嗎？以下，我們就來看看慕容燕的歷史認知，特別是關於慕容氏起源的探討。

關於慕容氏的起源，有以下三種的史料。按成書先後順序，分別為崔鴻《十六國春秋·燕錄》、魏收《魏書》卷95〈徒何慕容廆傳〉、《晉書》卷108〈慕容廆載記〉。

首先是崔鴻《十六國春秋·燕錄》（《太平御覽》卷121）的記載：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

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為號。……太康十年、又還于徒何之青山。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謂紫蒙之邑也。

高辛氏即帝嚳，曾於海濱遊玩時，將其幼子厭越留在那裡，成為北夷的君主。此後，世代居住在遼東，號稱東胡。秦漢時期，因被匈奴擊敗而逃到鮮卑山，所以改稱鮮卑。這裡將慕容氏的起源追溯至帝嚳，可能與慕容儁（319-360，348-360在位）即位時將五行定為木德有關。這點稍後會再詳細討論，在此，先確認帝嚳子孫成為東胡和鮮卑的主張。²⁸

相對地，魏收《魏書》卷95，〈徒何慕容廆傳〉記載：

徒何慕容廆，字奕洛瓌，其本出於昌黎。曾祖莫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平公孫淵，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祖木延，從毋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

²⁸ 羅新在〈民族起源的想像與再想像——以嘎仙洞的兩次發現為中心〉一文指出，《魏書》將宇文部稱為匈奴，將鮮卑的段部和慕容部稱為徒何，這是北魏的政策，目的在剝奪他們自稱為鮮卑的榮譽。羅新，〈民族起源的想像與再想像——以嘎仙洞的兩次發現為中心〉，頁5-25。

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何之青山。

對慕容氏起源的記載，是以慕容廆（269-333）自昌黎興起做為開端，與帝王沒有任何關聯。此外，又稱慕容廆為徒何，但徒何是一個與鮮卑無關的地名。這明顯反映北魏的認知，即否認慕容氏與帝王以及東胡、鮮卑有任何關聯。

不過，《晉書》卷108，〈慕容廆載記〉提到：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太康十年，廆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于上國。

慕容廆是昌黎棘城的鮮卑人，祖先是熊氏的苗裔，也就是黃帝的子孫。黃帝的子孫居住在北夷，號稱東胡，後來與匈奴並列為強勢部族，但被匈奴擊敗後退保鮮卑山，並以鮮卑自稱。《晉書》與〈序紀〉一樣，強調基於黃帝後裔說的中華正統性，以及基於東胡和鮮卑的北族正統性。此外，慕容廆所據守的大棘城被認為是顓頊的舊墟，進一步強化其正統性。

這裡需要考慮的是，《晉書》中「有熊氏之苗裔」的認識是在何時形成？唐代編纂的《元和姓纂》中，慕容氏被視為高辛氏（帝嚳）的子孫。此外，唐代的慕容氏墓誌也提到「其先昌黎棘城人」，並且說是前燕皇帝的後裔，但並未涉及古帝王。因此，《晉書》中的「有熊氏之苗裔」並非唐代的認知。²⁹同時，由於

²⁹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8，慕容氏「高辛少子居東北夷，後徙遼西，號鮮卑」，頁1228。慕容氏「後徙遼西夷，後徙遼西，號鮮卑」。〈慕容三藏墓誌（咸亨075）〉、〈慕容知禮墓誌（咸亨076）〉、〈慕容知廉墓誌（聖曆032）〉，以上皆收入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隋故金紫光祿大夫淮南郡太守河內公慕容府君墓誌·咸亨四年二月廿八日（咸亨075）〉，頁564-565，〈唐故三品孫慕容君墓誌銘·咸亨四年二月廿八日（咸亨076）〉，頁565，〈大周

《十六國春秋》和《魏書》中也不見此說，因此《晉書》的這種認知可能參考了慕容燕時期編纂的歷史書，例如范亨的《燕書》等。根據《隋書·經籍志》，范亨《燕書》20卷，記載慕容儁時事。慕容儁於352年即皇帝位，在確定五行時，群臣多認為應繼承晉朝的金德而定為水德，但他採用韓恒的說法，認為應繼承後趙的水德而採用木德。其子慕容暉時，郭欽上奏，再次確認應繼承後趙水德而定為木德。³⁰根據西漢末劉向（前77-前6）、劉歆（前?-23）以來的五德曆運說，黃帝（土）→少昊（金）→顓頊（水）→帝嚳（木）→堯（火）→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漢（火），高辛氏（帝嚳）屬於木德。³¹因此，慕容儁即帝位並將五行確定為木德時，似乎是接受了木德高辛氏（帝嚳）為始祖的說法。但是，五行與始祖不一致的例子也是有的。例如，北魏在孝文帝時改為水德，但始祖黃帝並未隨之變更。據此，不能斷言慕容儁定木德時就必然是將高辛氏視為始祖。假設慕容儁時期確定為木德，但始祖仍是黃帝，那麼《十六國春秋》中的高辛氏（帝嚳）視為始祖的說法可能是在北魏時所改。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是為了避免與北魏的黃帝後裔說相牴觸而修改，但無法確定這一改變是由崔鴻執筆，或是在北魏任職並編寫《燕書》的封懿所為。

無論如何，《晉書》中「有熊氏之苗裔」之說至少可視為是慕容儁即帝位前的歷史認知。范亨《燕書》是否記載「有熊氏之苗裔」尚不清楚，但如果慕容氏原本就持有「有熊氏之苗裔」這一說法，那麼仕宦於北魏的舊後燕漢人，對此事知情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上述推論無誤，那麼慕容部也有黃帝後裔、東胡、鮮卑

故左肅政臺侍御史慕容府君墓誌銘·聖曆二年八月九日（聖曆032）》，頁950。

³⁰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11，〈慕容暉載記〉，頁2851；佐川英治，〈漢帝國以後の多元の世界〉，收入南川高志編，《378年 失われた古代帝国の秩序》（東京：山川出版社，2018），頁176-227。佐川指出，後燕宣稱木德，不僅繼承了後趙的水德，還象徵慕容氏興起於東方的地位，這是一種既認同中原王朝又自視為東方王國的雙重認知。

³¹ 安居香山，《緯書》（東京：明德出版社，1969）。

山的一系列傳說，道武帝可能通過舊後燕系漢人獲得慕容部的這類歷史認知。可以認為這影響了〈序紀〉裡拓跋部的歷史認知。進一步說，慕容部的歷史認知被替換成拓跋部的歷史認知，藉此提升拓跋部在北族中的正統性。但是，如果拓跋部早在桓帝時代就已持有黃帝後裔說，那麼道武帝並非奪取慕容部的黃帝後裔說，而是拓跋部與慕容部各自在早期階段都已持有此說。無論如何，〈序紀〉和《晉書·慕容廆載記》之間的相似性，值得注意。

此外，在道武帝即位的祝文中提到「殪劉顯，屠衛辰，平慕容，定中夏」，這表明他平定了匈奴的獨孤部劉顯、鐵弗部劉衛辰(?-391)以及鮮卑的慕容部，進而平定中夏，這些被視為他即位稱帝的理由。對於同樣自認為鮮卑的拓跋部來說，與鮮卑正統相連的慕容部無疑是必須貶低的對手，這從《魏書·徒何慕容廆傳》的記述方式可以看得出來。在〈序紀〉中將鮮卑山稱為「大鮮卑山」，也反映拓跋部試圖凸顯其優越性的態度。³²

此外，羅新指出，有關慕容燕興起的讖言在北魏時被改編成與拓跋部興起相關的讖言。³³例如，黃泓(285-381)曾持用與慕容廆興起有關的讖言「真人出東北」。³⁴但到北魏時，此讖言被改編成道武帝興起的預言：「慕容氏太史丞王先曰：『當有真人起於燕代之間，大兵鏘鏘，其鋒不可當』。』³⁵羅新認為，原本真人將出現在東北的讖言被修改成北魏所盤據的燕代之間。筆者認為，後燕太史丞的說法，更強調的是拓跋氏將取代慕容氏而興的讖言。由此可見，道武帝時期否定慕容氏的正統性，並提升自身正統性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

³² 吉本在前文提及，將其稱為大鮮卑山的意圖是為了與拓跋之前的鮮卑諸部，特別是慕容部區分開來，這是一個值得認同的見解。吉本道雅，〈魏書序紀考証〉，頁62。

³³ 羅新，〈民族起源的想像與再想像——以嘎仙洞的兩次發現為中心〉，頁18。

³⁴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95，〈黃泓傳〉，頁2493。

³⁵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5之3，〈天象志·星變〉，頁2389。關於此讖語，田餘慶在前書中也指出，這顯然是道武帝周圍的人們捏造的謠言。參見田餘慶，《拓跋史探（修訂本）》，頁210。

第三章 烏洛侯國的遣使

本章中將討論與拓跋部原住地相關的史料，包括《烏洛侯國傳》和《禮志》中的記載。

首先，關於烏洛侯國，《魏書》卷100，〈烏洛侯國傳〉記載：

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世祖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

烏洛侯國位於地豆于的北方，距離代都（平城）四千五百里左右。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烏洛侯國前來朝貢，並報告說在其國西北方有國家先帝的舊墟，是一座南北九十步（約135公尺），³⁶東西四十步（約60公尺），高七十尺（約17.5公尺）的石室，室中宿有神靈，民眾多前往祈禱。太武帝聽聞後，派遣中書侍郎李敞前往當地祭祀，並將祝文刻在石壁上。這份祝文被收錄在《魏書·禮志》，1980年，米文平在嘎仙洞內發現的碑文經確認即是〈禮志〉載錄的原碑文。

比較嘎仙洞碑文和《魏書·禮志》的祝文後，結果可確認，《魏書·禮志》的祝文是在嘎仙洞碑文的基礎上進行了多處改寫。³⁷其中，〈禮志〉結尾處為「子子孫孫，福祿永延」，而嘎仙洞碑文則接續還有「薦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饗」。其內容是太武帝以皇祖、皇妣，亦

³⁶ 一步六尺（約150公分），以一尺約25公分計算。

³⁷ 町田隆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燾石刻祝文をめぐって——「可寒」・「可敦」の称号を中心として〉，收入岡本敬二先生退官記念論集刊行會編，《アジア諸民族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岡本敬二先生退官記念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4），頁89-114。

即可寒、可敦與天地之神共同祭祀供奉，而可寒（可汗）、可敦是遊牧國家中君主及其后妃的稱號。一方面，皇祖、皇妣指的是祖先或祖父母，由此可知拓跋氏的祖先或北魏初期的道武帝、宣穆皇后（?-409）³⁸被視為可寒、可敦。但更重要的是，太武帝是可寒、可敦的子孫。嘎仙洞碑文中未提及黃帝，反而僅採用可寒、可敦這類北族符號，根據內田的說法，³⁹這可以被解讀為向北族傳遞的一種信息。此外，町田指出，在鮮卑拓跋部的「可汗」稱號起初是對部族長的尊稱，隨著拓跋部勢力擴大，這一稱號逐漸演變成對內、對外的最高君主稱號。換句話說，隨著道武帝登基，「可汗」這一遊牧君主的稱號也同時確立，且早於柔然的社崙（丘豆伐可汗，?-410，402-410 在位）。⁴⁰因此，碑文使用「可汗」稱號，可視為拓跋部想以遊牧君主身份君臨北方世界的意圖。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修改是，〈禮志〉寫作：「稽首來王，具知舊廟，弗毀弗亡」，而嘎仙洞碑文則是「稽首來王，始聞舊墟，爰在彼方」。〈禮志〉的意思是「知道舊廟依然存在」，而嘎仙洞碑文意思則是「第一次聽說舊墟在那裡」，這表示太武帝是從烏洛侯國使者那裡第一次聽說石室的事情。基於這一點，閱讀《魏書·禮志》以下的內容：

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敞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謂魏國感靈

³⁸ 道武帝的皇后是慕容氏，但明元帝生母劉氏因子貴母死制被賜死後，明元帝即位後被追尊為皇后。由於這篇祝文是太武帝祭祀與其血統相關的人物，所以被認為祭祀的是宣穆皇后而不是慕容皇后。

³⁹ 內田吟風，〈北魏大邦城南碑文考〉，《龍谷史壇》，100（京都，1992.11），頁577-584。

⁴⁰ 町田隆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燾石刻祝文をめぐって——「可寒」・「可敦」の称号を中心として〉，頁89-114。

祇之應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

應注意到〈禮志〉的說法是，拓跋部在北方時，於烏洛侯國西北建造祖宗之廟，後來南遷遠離該地。太平真君年間（440-451），烏洛侯國使者來訪，說石廟仍然存在，於是派遣中書侍郎李敞前往，並認為拓跋部祖先早已建造了這座石廟。

此外，〈禮志〉稱其為祖宗之廟，而嘎仙洞碑文中則稱為舊墟。〈烏洛侯國傳〉也記為「石室」而不是廟。嘎仙洞是一個天然洞窟，因此說成以石頭雕鑿建廟不太合理。〈禮志〉將其定義為祖先之廟，是基於太武帝祭祀祖先的這一事實，並為了與〈序紀〉的記載相符，才說是在北方時以石頭築造而成。

那麼，烏洛侯國使者讓太武帝知曉石室的存在，並派遣李敞前往祭祀祖先並刻寫祝文。問題是，烏洛侯國如何得知石室就是拓跋部祖先的舊墟？根據〈序紀〉記載，拓跋部在烏洛侯國西北，即居住於大鮮卑山時期，可追溯到黃帝孫子時代到大約西漢末宣帝時期（前74-前48）遷徙到大澤的期間，這距離烏洛侯國遣使已是四百多年前的事。〈序紀〉提到拓跋部沒有文字，嘎仙洞中除了太平真君四年的碑文以外，也未發現其他文字。在此情況下，烏洛侯國判斷嘎仙洞是拓跋部舊墟的依據是什麼呢？顯然，並沒有確切證據能證明嘎仙洞是拓跋部舊墟。然而，更重要的是，當烏洛侯國報告嘎仙洞是拓跋部舊墟時，太武帝是認同的。為什麼太武帝會相信烏洛侯國的報告？以及，為什麼烏洛侯國要提出這樣的報告，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思考。

烏洛侯國遣使是在太平真君四年三月，讓我們確認一下這次遣使前後的情況。烏洛侯國與契丹、庫莫奚一樣，被記錄在《魏書》卷100，是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民族，被稱為「東北群狄」。契丹和庫莫奚在道武帝登國年間（386-396）被征討，之後向北魏遣使朝貢，進獻名馬、文皮。另一方面，居住在更偏遠地區的烏洛侯國，在《魏書》裡只有太平真君四年來朝的記錄。對北魏而言，烏洛侯國若不是太平真君四年來朝，甚至都還不知道有這個民族存在。

對北魏來說，北方地區最大的競爭對手是柔然。五世紀初，社崙自稱丘豆伐可汗，統治著西至焉耆、東至朝鮮、北至瀚海、南至大磧的領域。因此，小國無不飽受其侵略掠奪之苦，不得不臣服於柔然。北魏太武帝即位之初，柔然大檀（?-429，414-429 在位）繼立，自號牟汗紇升蓋可汗。大檀和太武帝長年交戰，神麤二年（429），受太武帝征討的大檀率領部族西逃。隨後在東至瀚海、西至張掖、北至燕然山，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的範圍內展開對大檀的大規模搜索。儘管未能捕獲大檀，但有三十萬高車諸部族投降北魏。並在巴尼陂獲得數十萬高車人。不久，大檀病逝，其子吳提（?-444，429-444 在位）即位，自稱敕連可汗。吳提在神麤四年（431）遣使朝貢，並於延和三年（434）與北魏建立婚姻關係。然而，太延二年（436），吳提破壞和親協議並入侵，此後雙方在太延四年（438）、五年（439）、太平真君四年、五年（444）等多次發生戰鬥。

再加上自 432 年起，北魏連年攻打北燕，436 年的大規模攻勢迫使馮弘（?-438，430-436 在位）逃亡高句麗。北燕的滅亡改變了東北地區的政治局勢，原本臣屬北燕或受其壓迫的東北地區各部族開始與北魏交流。羅新指出，這一情況促使烏洛侯國派遣使者。⁴¹

以上，根據烏洛侯國遣使前後的情況，可以確認太武帝多次對柔然和北燕征討。將北魏在北方世界的擴張與烏洛侯國的遣使聯繫起來，這樣的思路應該不至於有大錯。此外，町田也指出，嘎仙洞碑文記有可寒、可敦，這在與柔然的對抗上有其必要性。⁴²

這段時期更值得注意的是，太武帝在神麤二年和太延五年兩次進行國書編纂。關於國書編纂的目的，《魏書》，卷 35，〈崔浩傳〉提到：

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

⁴¹ 羅新，〈民族起源的想像與再想像——以嘎仙洞的兩次發現為中心〉，頁 12。

⁴² 町田隆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燾石刻祝文をめぐって——「可寒」・「可敦」の称号を中心として〉，頁 89-114。

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惟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神麇，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群公卿士宣力之効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為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

神麇二年進行的第一次國書編纂，旨在記載道武帝和明元帝未能完成的荒域之外尚未臣服勢力的平定，即對北方柔然和赫連夏的征討。⁴³而太延五年的第二次國書編纂，則是為了將神麇二年以後的華北統一偉業流傳後世，這部國書在太平真君十年（449）左右完成。烏洛侯國的遣使正值第二次國書編纂時期。

為什麼太武帝會相信烏洛侯國的報告呢？正如羅新所看穿的，這是因為該報告對提升鮮卑正統性具有明確的證據價值。對於與柔然爭霸的太武帝而言，報告中「拓跋部先帝舊墟位於烏洛侯國西北」的情報，證實了拓跋部原本就在大興安嶺北部。⁴⁴大興安嶺北部即〈序紀〉所稱的大鮮卑山，證明了拓跋部是鮮卑的正統後裔。太武帝命李敞刻寫的碑文，記下拓跋部的祖先是可寒（可汗）、可敦，目的是為了表明拓跋可汗相對於柔然可汗的正統性。

此外，這也與《魏書》記載柔然為東胡後裔有關。鮮卑原本

⁴³ 松下憲一，〈北魏崔浩國史事件——法制からの再簡討〉，《東洋史研究》，69：2（京都，2010.9），頁31-58。

⁴⁴ 羅新在〈民族起源的想像與再想像——以嘎仙洞的兩次發現為中心〉一文中指出，烏洛侯國的報告為拓跋部的起源提供了堅實有力的證據。羅新，〈民族起源的想像與再想像——以嘎仙洞的兩次發現為中心〉，頁5-25。

就是東胡，這意味著拓跋部和柔然同源。雙方爭奪誰才是北方世界的正統統治者。《魏書·禮志》中提到，祭祀後斬下的樺木成長為林，當地居民認為這是「魏國感靈祇之應」，因此更虔誠地祭拜，這說明了北魏受到神靈祝福，並獲得北方世界民眾的認可。

另一方面，烏洛侯國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報告呢？可推測的是，烏洛侯國這樣的小國，在面對北魏和柔然這兩大北方世界勢力時，可能陷入應依附哪一方的困境，於是試圖通過朝貢討好北魏，並做出令太武帝高興的報告。然而，從之後烏洛侯國的動向觀察，並未再向北魏朝貢，也沒有被柔然統治的跡象。考慮到烏洛侯國只在太平真君四年朝貢一次，且對北魏而言是一個遙遠而未知的民族，因此這份報告是否真的是由烏洛侯國提出，仍然存疑。儘管純屬推測，但太武帝可能是為了證明拓跋部起源於大鮮卑山，特意安排烏洛侯國使者來報告國家先帝的舊墟。不管真相如何，烏洛侯國的報告對太武帝而言確實是有用的。

結論

本文對拓跋部的原住地及南遷相關史料（〈序紀〉、〈烏洛侯國傳〉、〈禮志〉）的內容，以及各個史料的撰寫目的、背景進行了考察。〈序紀〉可以分為神元帝誕生故事前後兩部分。前半部描述黃帝子孫居住在北方的大鮮卑山，然後從那裡南遷至大澤和匈奴故地的歷史。這是為了表明道武帝於天興元年即帝位時，拓跋部繼承了黃帝子孫的中華正統性和居住在大鮮卑山的鮮卑正統性，而這部分是根據鄧淵《代記》的歷史認知所撰成。另一方面，後半部從「真人代歌」所歌頌的「祖宗開基所由」的神元帝誕生故事開始，描繪了神元帝建立部族國家以及拓跋部後來的發展歷程，以作為「君臣興廢之跡」。〈序紀〉主要即依據《代記》和「真人代歌」這兩部史料撰寫而成。

烏洛侯國傳的內容意味著，太武帝在與柔然、北燕的霸權爭奪中，利用了烏洛侯國的報告。因為該報告指出國家先帝舊墟位

於烏洛侯國的西北，故以此支持〈序紀〉中提到拓跋部曾居住大鮮卑山的記述（其根源來自《代記》）。此外，嘎仙洞碑文則是在與柔然爭奪北方世界霸權過程中，為了顯示拓跋部祖先是可汗、可敦而刻寫的。

〈禮志〉的內容，為了記載太武帝在國家先帝的舊墟石室中祭祀祖先之事，將石室描述成是拓跋部在北方居住時鑿石建造的祖廟，並解釋後來因南遷而變得遙遠，這是為了與〈序紀〉的記述保持一致。

迄今為止，拓跋部的原住地一直被認定是大興安嶺北側（內蒙古自治區阿里河鎮）的嘎仙洞，這是根據被視為正確無誤的《魏書》相關記載，再加上嘎仙洞碑文的發現而得出的結論。此外，〈序紀〉中的南遷故事也被視為史實，又結合鮮卑考古遺址，設定出從大興安嶺北側經過呼倫湖到內蒙古南部和林格爾的南遷路線。然而，如果原住地和南下相關史料都是後世創作而非反映史實，那麼，結合考古學成果所確立的拓跋南遷路線也需要重新評估。

那麼，拓跋部的原住地究竟在哪裡呢？甚至有人質疑拓跋部到底是不是鮮卑？筆者並不認為〈序紀〉的所有記述都是創作出來的。〈序紀〉包含基於拓跋部歷史傳承的「真人代歌」部分。那被認為是始祖神元帝以後才開始的。因此，可以考慮拓跋部的原住地位應該是在神元帝曾設立據點的長川到盛樂附近，即內蒙古呼和浩特周邊。⁴⁵此外，對於拓跋部是否為鮮卑族的疑問，筆者

⁴⁵ 韓昇、蒙海亮在前述論文，根據調查隋朝元威的父系遺傳子後，發現它高頻度地分布在蒙古東部的貝加爾地區，因此得出拓跋部從外貝加爾地區移動到呼倫湖的結論，這與傳統上將嘎仙洞視為拓跋部發源地的說法有所不同。對於拓跋部的發源地，除了傳統的文獻學和考古學外，還引進體質人類學和分子人類學的方法，分析遺骨特徵和遺傳類型分布。雖然韓昇、蒙海亮的論文也是這些新研究領域的成果之一，但從遺傳類型的分布來看，雖然能了解元威與相同遺傳類型的分布情況，但拓跋部這個集團的形成及其與這些遺傳類型之間的關係尚不清楚。據推測，他們在外貝加爾地區居住時應不會自稱為拓跋部。根據文獻，拓跋部集團的形成約在三世紀左右，若以拓跋部集團形成期的居住地做為發源地，應該位於內蒙古南部。然而，就構成拓跋部的人群來看，至少可確定元威的祖先來自外貝加爾地區，但不能認為所有拓跋部的成員都是從同一地點移動而來。參見韓昇、蒙海亮，〈隋代鮮卑遺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頁128-140

認為，拓跋部在自己稱為鮮卑的時候，那麼就應該被視為鮮卑。根據游牧民族的群體命名原則，這解釋是合理的。⁴⁶拓跋部在三世紀中葉，在始祖神元帝領導下於內蒙古南部建立了勢力，隨後與遼東地區的勢力——即宇文部和慕容部——建立了深厚關係。⁴⁷宇文部和慕容部被認為是歸附檀石槐的大人，⁴⁸拓跋部在這樣的關係中，也可能假借西部大人推演，而自稱鮮卑。此外，在推翻慕容氏的過程中，拓跋部特別強調自己是鮮卑的正統繼承者，從而確立了在北方世界的統治地位。《魏書·序紀》、〈烏洛侯國傳〉和〈禮志〉，都明確地展示上述的這種北魏歷史認知。

（責任編輯：林煒恩 校對：林家維）

⁴⁶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30，〈魏書·鮮卑傳〉注引王沈《魏書》：「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頁835），顯示當游牧民族屬於一個較大的集團時，會以該集團名做為自稱。

⁴⁷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13，〈官氏志·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東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時東部，此二部最為強盛，別自有傳」（頁3012），但拓跋部與宇文、慕容有關聯是在神元帝以後的事情。

⁴⁸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82。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 春秋·左丘明著，吳·韋昭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西晉·陳壽撰，《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東晉·郭璞注，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梁·沈約注，方詩銘、王修齡輯證，《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北齊·魏收撰，《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
- 後晉·劉昫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 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二、近人專書

- 田餘慶，《拓跋史探（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 馬長壽，《烏桓與鮮卑》，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62。
-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板橋：稻鄉出版社，1995。
-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內田吟風、田村実造等訳注，《騎馬民族史·正史北狄伝》，第1冊，東京：平凡社，1971。

田村實造，《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動期：五胡・北魏時代の政治と社会》，東京：創文社，1985。

安居香山，《緯書》，東京：明德出版社，1969。

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の楽制と国家：日本雅楽の源流》，京都：文理閣，2013。

三、近人論文

米文平，〈鮮卑石室的發現與初步研究〉，《文物》，1981：2，北京，1981，頁 1-7，後收入氏著，《鮮卑史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頁 29-36。

李志敏，〈嘎仙洞的發現與拓跋魏發祥地問題〉，《中國史研究》，2002：2，北京，2002，頁 59-69。

宿白，〈東北、內蒙古地區的鮮卑遺跡——鮮卑遺跡輯錄之一〉，《文物》，1977：5，北京，1977，頁 42-54。

張博泉，〈嘎仙洞刻石與對拓跋鮮卑史源的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1993：1，哈爾濱，1993，頁 55-61。

楊軍，〈拓跋鮮卑早期歷史辨誤〉，《史學集刊》，2006：4，長春，2006.07，頁 124-131。

韓昇、蒙海亮，〈隋代鮮卑遺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學術月刊》，2017：10，上海，2017.10，頁 128-140。

羅新，〈民族起源的想像與再想像——以嘎仙洞的兩次發現為中心〉，《文史》，2013：2，北京，2013，頁 5-25。

内田吟風，〈魏書序紀特に其世系記事に就て——志田不動麿学士「代王世系批判」を読む〉，《史林》，22：3，京都，1937.03，頁 455(19)-481(45)。

内田吟風，〈烏桓族に関する研究：上代蒙古史の一部として〉，原刊田村實造編，《滿蒙史論叢》第四（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43.9），頁 1-104；後改題〈烏桓鮮卑の源流と初期社会構成——古代北遊牧民族の生活〉，收入氏著《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頁 1-93。

内田吟風，〈北魏大邺城南碑文考〉，《龍谷史壇》，100，京都，1992，

頁577-584。

田村実造，〈北魏開国伝説の背景〉，《東方学論集》，通号2，東京，1954.03，頁104-115，後收入氏著，《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動期：五胡・北魏時代の政治と社会》，東京：創文社，1985，頁。

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史学雑誌》，1910-1913，後收入氏著，《塞外民族史研究》，上，收於白鳥庫吉全集第4卷，東京：岩波書店，1986，頁63-320。

吉本道雅，〈魏書序紀考証〉，《史林》，93：3，京都，2010.05，頁58(418)-86(446)。

佐川英治，〈東魏北齊革命と『魏書』の編纂〉，《東洋史研究》，64：1，京都，2005，頁37-64。

佐川英治，〈漢帝国以後の多元的世界〉，收入南川高志編，《378年失われた古代帝国の秩序》，東京：山川出版社，2018，頁176-227。

佐藤賢，〈鮮卑拓跋氏の南下伝説と神獣〉，《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8，福岡，2010.04，頁1-29。

町田隆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燾石刻祝文をめぐって——「可寒」・「可敦」の称号を中心として〉，收入岡本敬二先生退官記念論集刊行会編，《アジア諸民族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岡本敬二先生退官記念論集》，東京：国書刊行会，1984，頁89-114。

松下憲一，〈北魏崔浩國史事件——法制から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69：2，京都，2010.09，頁205-232。

園田俊介，〈北魏・東西魏時代における鮮卑拓跋氏（元氏）の祖先伝説とその形成〉，《史滴》，27，東京，2005.12，頁63-80。

譯者誌：

本文原作者松下憲一教授，任教於日本愛知學院大學文學部歷史學科，專長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特別關注北方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主要著作：《北魏胡族体制論》（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7）、〈北魏部族解散再考〉（2014）、〈北魏の後宮制度〉（2016）、〈后妃のゆくえ——北齊・北周の後宮〉（2017）、〈拓跋鮮卑の南下伝説〉（2020）等。以及做為「講談社選書メチエ」系列選書之一，奠基過往研究與授課講義而改以通俗筆法撰寫的《中華を生んだ遊牧民：鮮卑拓跋の歴史》（講談社，2023）。松下教授對北魏史的研究，頗受學界肯定。例如《北魏胡族体制論》一書中，對北魏的「部族解散」、「領民酋長制」及「內朝官」等制度的分析，深入探討其支配構造，為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貴族制提供新視角，有重要參考價值。

譯者是在 2010 年臺灣大學舉辦的「第四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結識松下憲一教授。爾後，常在中國、日本等地的學術研討會中見面，彼此有所交流，松下教授總是熱情贈予最新大作。近年來，譯者對拓跋人溯祖黃帝的歷程甚有興趣，曾撰文分析《魏書·序紀》首段的史料來源。後有機會閱及〈拓跋鮮卑の南下伝説〉一文，才發現松下教授也做過類似的工作。而且，松下依據《魏書·序紀》、《魏書·禮志》等記載，以細緻的考證推論，重新釐清拓跋鮮卑的遷徙傳說與建國歷程。文中所提出來的觀點，譯者認為對理解北魏開國前後，如何利用祖源傳說重塑拓跋族人認同，並以此與柔然等勢力爭奪北亞霸權，很有參考價值，故譯出以供學界參考。譯文內的圓圈數字，係原文所用之符號，旨在將《魏書·序紀》內容分句，細考其史料來源，特此說明。本譯文經松下教授過目指正，唯若仍有不妥之處，則應歸責譯者，敬請讀者諒察。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Legend of the Tuoba Xiabbei: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Northern Wei

Kenichi Matsushita*

Chen, Shih-jen (trans.)**

Abstract

Scholars remain uncertain regarding the original homeland of the Tuoba people, founders of the Wei dynasty. The *Wei Shu* (Book of Wei), in particular the sections “Li Zhi” (Treatise on Rituals), “Wuluohu Guo Zhuan” (Account of the Wuluohu Nation), “Xu Ji” (The Preface), contains valuable information. Drawing on this material, scholars have hypothesized that the Tuoba originally lived in the Greater Khingan Range. Subsequ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cluding Tuoba Xianbei sites in Heilongjiang, Liaoning, and Inner Mongolia, as well as the 1980 unearthing of the Gaxian Cave inscription, have support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northern segment of the Greater Kingan Range as the Tuoba ancestral homeland. This conclusion corresponds with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route described in the *Wei Shu*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dominant theory in scholarly circles.

As might be expected, this dominant view has not gone unchallenged. This paper seeks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origins of the Tuoba by reexamining the relevant entries in the *Wei Shu*. In doing so, it also explores the authorial intent behind the text and considers what it reveals about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Keywords: Touba Xianbei, The Legend of Southward Migration, Wei Shu(Book of Wei), Historical Conciousnes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aculty of Letters, Aichi Gakuin Univers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